



孔庙从祀与乡约

朱鸿林
明史研究系列

朱鸿林
明史研究系列

孔庙从祀与乡约

朱鸿林 著

生活·讀書·新知 三联书店

Copyright © 2015 by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All Rights Reserved.

本作品版权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所有。

未经许可，不得翻印。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孔庙从祀与乡约 / 朱鸿林著. — 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2015.6

(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

ISBN 978-7-108-05063-2

I. ①孔… II. ①朱… III. ①孔庙-祭祀-研究-中国-明代②乡村-管理-章程-研究-中国-明代
IV. ①K892.98②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123033 号

责任编辑 张 龙

装帧设计 蔡立国

责任印制 徐 方

出版发行 **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

(北京市东城区美术馆东街 22 号 100010)

网 址 www.sdxjpc.com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毫米 × 1230 毫米 1/32 印张 12.375

字 数 296 千字

印 数 0,001 - 5,000 册

定 价 52.00 元

(印装查询: 01064002715; 邮购查询: 01084010542)



广州新凤凰村旧乡约所

2001年5月



在香港孔子学院院长室

2012年11月

试读结束：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www.ertongbook.com

总序

三联书店出版的“朱鸿林明史研究系列”专题论文集五种，收录了我1984年至2013年三十年间出版的论文、讲稿、书评、序记、纪念性文字约八十篇，一百六十多万字，写的主要是明代人物、著作、学术、政治、社会之事，原刊多数载于境外刊物，其中约有二成原是英文。各集文章整体上新题多于老题，至少在原初发表时是这样；对于近世的君主与儒者、思想与制度、著作与版本的研究，多用未经人用的文献材料展开，或对众所利用的文献做出重新解读，以个案论析为基础，而以观察和提示个别事物的特色或同类事物的长期发展趋势为旨归。

我对明史研究情有独钟，与个人求学和工作经历有密切关系。在香港珠海书院念书时，罗香林先生（1905—1978）和王韶生先生（1904—1998）讲授的南明史事和明清广东学术，已经引起了我对明朝历史和岭南历史的兴趣，专心研究明史则是从1970年代末留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东亚学系时开始。当时的普大东亚系是北美中国近世历史文化的教研重镇，师资优良，环境理想，有著名汉学家和元明史专家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 1922—2005）、宋史专家刘子健（James T. C. Liu, 1919—1993）、唐史专家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 1925—2006）、学术思想史专家裴德生（Willard J. Peterson, 1938—）等先生组成的历史文化专业的教师队伍，有众多资优的学生在学，各

地著名的中国历史学者经常到访，《剑桥中国史·明史卷》正在那里编纂，还有葛斯德图书馆（Gest Library）的丰富藏书可供阅读参考。葛馆所藏，宋元明清原刻本书籍都有，而以明刻本种类居多，还有七百多种影印自日本内阁文库收藏的明人文集，其中不乏人间少见之书，都是研究明史的宝贵材料。

我有幸师从以上几位老师读书问学，并且在牟复礼先生主要指导下完成研究丘濬《大学衍义补》及15世纪经世思想的博士论文，随后又留校工作，阅读上述的日本内阁文库所藏明人文集，撰写提要。在普大读书和工作十年，早与明史结下不解之缘。之后我到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接替黄彰健先生退休留下的职缺，做的仍是明史领域内的研究。在台多年，得以肆览史语所傅斯年图书馆以及台北市内“中央图书馆”的善本书藏，益感明史研究可以乐趣无穷，而且有很多资源和课题可以开发，所以在获选为美国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驻院学者的一年中，在美国国会图书馆阅读的书籍和收集的材料，也都与明史研究有关。到了新的千禧年开始时，我返回香港高校任教，明史研究便已是自己“无所逃于天地之间”之事，而讲授的课程多与明史有关，指导研究生选的主要是明史课题，自己继续研撰发表的论著也多在明史领域之内。年深岁久的累积，便是这个“系列”所收录的文字。

“系列”中各书的内容撮要如下：

（一）《明太祖与经筵》。收录论文11篇，主要研究明太祖的政治理想、治国理念及实践、文化素养，以及明代洪武、嘉靖、隆庆、万历等朝的帝王经筵讲学情形，由此显示帝王与士大夫在政治认识和文化传承上的同异情况，以及士大夫对于劝导君主接受儒家政治理念的思想上和制度上的努力。

（二）《孔庙从祀与乡约》。收录论文13篇，主要研究明朝孔庙从祀的情况，特别是元明两代儒者的从祀情况，以及明代南北

各地方的乡约内容与实施状况。孔庙从祀诸篇论析此典礼所牵涉的学术与政治问题，及其所反映的文化价值取向。乡约研究各篇论析士大夫官员构思及展现其经世化俗、维持地方治安理想的情况。

(三)《儒者思想与出处》。收录论文19篇，主要透过对多种重要的传统论著及其不同版本的深入探讨，并结合细致的人物研究，论析南宋至清初、尤其是明代重要儒者的思想、学术、交游等所反映出来的个人或时代特色，重要论著的著述背景、缘起、影响及其思想文化史意义。这些论文也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思想文化史的研究取向和方法问题。

(四)《文献与书刻》。收录论文19篇与专书中两章，主要从明清文献、尤其明人文集的研究，包括书籍的刊行历史以及文本所呈现的情形，研究被忽略或被误解的历史人物、事件、著作等，以及解读文献的态度和方法问题；同时从书籍历史的角度，介绍宋元明清版刻书籍源流中明代书刻的特别情状，尤其是能够反映文化品位和价值取向的情状。

(五)《〈明儒学案〉研究及论学杂著》。收录研究《明儒学案》性质、该书所载人物的深入个案、该书的文本差异及其所带来的理解困难等问题的论文7篇、讲稿2篇；解释该书近代刊本在点校上的错误之处的“释误”专题数十条。此外收录评论近人所撰明代思想史、地方史、社会史、政治史的中英文专书之书评5篇。附录为反映作者为学历程的文字。

以上各书的具体内容，多少体现了我从事历史研究所关心的问题以及所守的原则和所取的途径。本着野人献曝的心意，以下不揣谫陋，依次略作说明，以志这些论集能与读者相见的因缘，并且聊当酬谢读者惠赐阅览的雅意。

我在阅读历史记载时，多数不会先存疑心，但过程中却会产

生不少疑问。我的疑问往往又和我关心的现代问题有关，久而久之，便形成了一些主导性的研究课题，虽然以后的具体研究和结论并不针对缘起的问题而发。主导性课题的开展，往往又会延伸到其他的相关课题，研究于是逐渐形成范围和层次。例如，我想知道我作为读书人除了修身之外，应该做些什么事才能对国家和社会有益，因而就去研究古代读书人对此事怎样想和怎样做。我对近世经世之学的理论层面和应用层面的研究，便是这样开始的。对于旨在诱导帝王的经筵制度和旨在化民成俗的乡约制度的研究，也于是产生。而如上这些探究，辗转又引导我到深入研究明太祖治国理念及其实践、明代两广地方的民族问题和地方治安上去。

又如，我想知道儒学的实质究竟是什么？被历史肯定的儒者和他们的学术主张是怎样的？他们的学问是怎样做成和展现的？我想这得研究古代士大夫和读书人是怎样看待和讨论这些问题，他们的价值观和行为规范又是怎样的。这引起了我对朝廷承认真儒并且给予最高表彰的孔庙从祀制度、儒者对出处问题的论述和处理、理学对家庭礼仪及社区规范的作用等的一连串研究。再如，学者容易因为书籍的版本和文本的问题而被误导，产生偏颇。所以，我对重要而有影响的著作的文本及其现代刊本的句读，相当重视，见到其中的错误之处，都希望能够加以纠正，给予读者方便，并且有需要和可能时，还会略为解释致误的缘故所在，使读者增益新知。我研究传世经典《明儒学案》，纠正其坊本的错误句读，进而对此书的文本作全部整理，便是源于这个想法。

此外，还有一些课题是源于读书和研究中“方以类聚、物以群分”的习惯。在读了一定数量的同类书籍之后，或在通读某个人物的全部著作之后，往往会发现某人或某些人有一些经常性的

议题或论述，这些议题和论述有的个性很强，有的共性很强，这便形成深入的个人传记研究以及同时或异代的比较研究。我从发展的角度看到个人的变化，从比较的角度看到同类的特色，本“系列”中很多思想文化史范围内的论文，其研究缘起便是这样的。

我的基本守则是：不在热闹场所争取表现，不论述他人已作研究而理据基本可取的事物，只求自己有所创新，或者能够订正前人之误、补充历来之阙，但不隐讳自己的错误，不作无根之谈，不作哗众夸张之言，不作条件尚未成熟的概论。历史论述本质上不同于媒体文章和作家的作品，不以迅速报道一时所见或披露惊世异闻为主，不以鼓动一时人心和争取读者为尚。论述着重的是根据充分可靠的资料和证据，重构情景，展示真相，客观地解释事情和现象的意义，以供读者参考。我本着这样的认识，要求自己谨慎从事。

在研究的工序上，我一般先从理解文献和文物资料下手，读通基本材料，旁及与问题相关的时地人情材料，再将这些材料依其形成或出现的先后，稍加编列，再度通读，然后形成基本的论析架构，开始撰写。在撰写过程中遇到所用材料本身出现问题，如文字形成的时间，文本的可靠性，前人的理解等，随即给予应有的考证辨明，决定作者之或真或伪，议论之可信可疑，然后据以理解古人所描写叙述的意义及其立言的原委和旨意，建立自己的观点，进行推理，阐释古人所寄寓的情思义理，导出结论，尽量做到真正的同情理解。在处理较长时段的事情和现象时，我认为没有足够的坚实个案研究，很难提出客观而周延的解释，所以我的研究都以个案为先，要在掌握一定数量的代表性个案之后，看到相同或不同的时空人情所呈现的各种状况，才做概括性的综论或定论。

总之，我的研究课题多数出于对现实的关注，对成说的质疑，对基础工作的重视。我着重基础和具有奠基意义的研究，尤其重视以文献研析为本的个案探索，而不急于成一家之言。我又因为参与教学之故，特别关心学生对专题研究是否能够看得明白，所以越是近期的文字越是相对比较浅易。知识要能普及才会有用，这个“系列”的出版，最终也是基于这个意义而来。

我出版过的文字，从前很少结集成书，直到2005年才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中国近世儒学实质的思辨与习学》一书，由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明人著作与生平发微》一书，各收录论文13篇。不出文集的主要考虑是因为这些文字基本上是属于所谓“专家之学”，专家自会寻看，不必灾及枣梨，何况其中所考或欠周详，所论未必精当，贸然面世，于已于人都属无益。此外，我希望成书行世者是完整的研究专著。我规划过的专著课题，关于社会秩序更生的，有地方乡约制度、两广瑶族和朝廷及地方政府的关系、明太祖的治国理念及其实践情况等；关于思想文化的，有孔庙从祀制度、帝王经筵讲学制度、岭南儒学、明代前期儒学发展等；关于经典著作和文献的，有对真德秀《大学衍义》、丘濬《大学衍义补》、湛若水《圣学格物通》及黄宗羲《明儒学案》的研究，对稀见明人文集的叙录。很惭愧，因为才疏事冗，不能达到“用志不分，乃凝于神”的境界，原拟近世整体处理的课题，只能集中处理明代的，而且也还在累积个案，等待总结。求全备美的结果，极可能便是“头白可期而汗青无日”。这对个人而言其实并不重要，虽然对促进学术而言，或可另当别论。

三联书店出版的这一“系列”，出版的原动力其实来自我的研究生们。他们有的认为我的论著曾经启发过他们，而且因为很多论文只有英文原本或只刊登于境外刊物，国内同行学者和研究

生多数未曾经见，如果能够在国内出版，说不定我提过的议题，做过的个案，也会引起他人注意，相关研究因而增加，学术因而有所推进云云。我虽然主张读书贵有心得，不随他人起舞，但想到能够方便学者参考，也是应有之义，所以也就同意他们的建议，由他们分工校读，编成专题论集。在英文原稿的中译上，从前我自己做的，由我重新再看；曾经2006年下半年在香港中文大学历史系开设的“中国古代及近世史专题研究：中国近世思想与制度”课程班上的同学初译和讨论过的，由陈健成君核对，然后由我详细订正甚至改写。当年参与初译的同学，有香港中文大学何伟杰、马增荣、郭锦洲、杨吟、刘勇、谢茂松，香港科技大学陈士诚，香港城市大学陈学然诸君。“系列”中《文献与书刻》取自《书法与古籍》一书第四、第五两章的文字，出自中国美术学院毕斐教授的译笔。“系列”初稿的校读，由新旧门人中山大学的洪国强、邓霆、龙伟明，香港理工大学的谭卫华、何威萱、陈冠华，香港中文大学的卢志虹、陈健成、吴兆丰、朱冶、杨吟、邓国亮、刘勇和解扬诸君分工完成。其中刘勇和解扬辛劳尤多；刘勇主导编辑，解扬联系出版，在我通读“系列”全部三校稿之前，二人又共同通读全稿，提出应予改善之处。我对他们充满感谢，希望他们的辛劳也给他们带来新的体会和领悟。

“系列”承蒙三联书店给予出版，我尤其要表示感谢。我希望这一系列的论著确能为研究中国近世尤其明代历史和文化的学者提供参考，能使我不辜负三联书店的错爱和我的学生们的热情，并借以纪念栽培和勉励我的先师们，致敬于关心和爱护我的长辈们、同情和帮助我的同学朋友们。

朱鸿林序于香港理工大学孔子学院

二〇一三年农历除夕

目次

总序	1
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	1
元儒熊禾的传记问题	24
元儒熊禾的学术思想问题及其从祀孔庙议案	44
元儒吴澄从祀孔庙的历程与时代意涵	84
《王文成公全书》刊行与王阳明从祀争议的意义	125
阳明从祀典礼的争议和挫折	151
王阳明从祀孔庙的史料问题	175
国家与礼仪：元明二代祀孔典礼的仪节变化	198
中国近世乡约的性质、有效性及其现代意义略论	223
二十世纪的明清乡约研究	242
明代中期地方社区治安重建理想之展现	
——山西、河南地区所行乡约之例	270
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	292
附：《明代嘉靖年间的增城沙堤乡约》书后	359
20世纪初越南北宁省的村社俗例	361
文章出处	381

儒者从祀孔庙的学术与政治问题

今天来到清华演讲，我感到非常荣幸，也非常高兴。（刚才李伯重教授介绍时提到的）牟复礼（Frederick W. Mote）先生是我在普林斯顿时的老师，此前，我在香港时的一位很重要的老师是罗香林先生，他是清华毕业生。所以，今天能够来到老师从前念书的校园活动，我真是感到非常高兴。今天要报告的是我长期的研究计划之一，跟孔庙（或称文庙）从祀的历史有关。我的研究习惯是从个案开始，累积到一定数量的个案之后，然后才提出一些比较宏观、概括的综述。现在的研究还没有到这个地步。但今天如果我讲一些太专的个案，大家也不一定会感兴趣，所以想要讲的虽然还是在那个范围之内，但也会比较集中一点，主要是讲在儒者从祀孔庙的事情上，学术如何与思想、政治联系在一起的问题。

儒者从祀孔庙，是国家重要的政教制度和典礼。这个制度和典礼，从唐太宗贞观二十一年（647）开始。最后一次是民国八年（1919），徐世昌当总统时举行的。这次活动在此地来讲是一件特大事情，因为被从祀的两名儒者，一个颜元，一个李塨，他们是躬行学派的领导人，都是北方的学者。今天我们去看一些完整的孔庙时，比如说看台南市的孔庙或台北市的孔庙，所有从祀

儒者的木主牌位还是有的，两边长廊排在最后的那两个牌位，就是颜元和李塏的。孔庙从祀这个制度维持了大约一千三百年，时间很长。从祀颜元、李塏的北洋政府也没有说从此不再搞从祀，虽然此后实际上也没有再举行过。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读儒家书籍的人很多，儒者在学问上也各有其趣，那么儒者从祀孔庙就必定有个标准才行。

这里我得先交代一个事情。很抱歉我来不及绘一个孔庙的布局图，只能请您想象一下。您要想象您现在去了一处文庙，一进去看见的主建筑就是大成殿，有台阶可以上去。大成殿里面正中供奉了庙主的牌位，这便是孔子的木主。孔子大概除了曲阜的孔庙是用塑像来代表，其他文庙用来代表的都是木主。孔子两旁稍前，各有两个木主，它们是被称为“四配”的；四配两旁稍前各有六个木主，它们是被称为“十二哲”的。四配和十二哲都在大成殿内紧随着孔子接受祭品。典型的孔庙，大成殿门外两边各有走廊，叫做东庑和西庑，从祀的先贤和先儒的木主，都放在里面。在制度有效的时期，全国各级行政区里唯一官立学校所在地旁，都有一座文庙，都会按时举行春秋二祭，来祭祀庙里所有的人物，从孔子到所有的从祀儒者。今天我想讲的，就是围绕着谁的木主能够被放进孔庙或者会被请出孔庙的问题。

先讲一下孔庙祭祀的最高原则，也就是根据什么来认定一个人是值得从祀孔庙的儒者的原则。这个原则叫做“崇德报功”。崇德报功的意思很明显，就是尊崇你的德行而报答你的功劳。但重点在“功”，因为祭祀基本上就是“报功”之道。如果一个人没有功，他就不应该接受人家的祭祀。从祀的儒者之功，就是实践孔子之道之功，发明孔子之道之功，而且这功是明显的。从祀的关键问题，就是这功的认定。有功的儒者便是真儒，所以问题也就是真儒的标准之认定。真儒的标准，不同时代是有所改变

的。这也是研究的意义所在。我们由从祀哪一类的儒者的事情之中，就可以发现某一个时代对儒学的解释和期待是怎么样，当时所强调的是儒学的哪些方面，等等。

前面说过，历史上儒者从祀孔庙从唐朝贞观二十一年开始。稍需说明的是，此时还不称为从祀，而是称为“配享”。当时一口气就配享了二十二名从春秋末年一直到两汉魏晋的儒者。这些儒者都被称作“先师”，孔子则是“先圣”。在贞观二十一年之前，配享孔子，陪孔子一起接受祭礼的先师，只有颜回一人。这次新增的二十二名先师，到底有什么特点呢？分析起来可见，他们都是对《六经》等儒家经籍的传播、承传有功的，或者是对这些经籍的传注、笺释有功的。我的旧同事黄进兴先生在所著《优入圣域》书中指出，他们可以分为“存经”之儒和“传（zhuàn）经”之儒两类。^{〔1〕}存经之儒有保存经典使之流传之功，传经之儒有解释和阐明经典之功，而存经之儒大多数也是传经之儒。

接下来的问题是，这些人可以和颜回一起配享，他们的功是根据什么原则来定的？当时配享他们的唯一理由，是所谓“代用其书，垂于国胄”。“国胄”是国子学的学生，就像诸位一样，是国家最高学府的学生。什么是“代用其书”？“代”字其实是避唐太宗名讳的字。唐太宗名李世民，“世”字讳作“代”字。所以“代用其书”是说世上、社会上都用他们所著之书。他们所著之书放在国学里，而读这些书的国学生都是要出来当官的。这些先师让他们能够读懂经典，从而为国家服务，因此有功，应该接受祭祀。由此可见，“释经”之作是当时评价儒学贡献的决定性指

〔1〕 黄进兴，《优入圣域：权力、信仰与正当性》（台北：允晨文化实业股份有限公司，1994），页231。

标。你要做个名儒，就至少要注释出一本经书来，让学者对经典有进一步的了解。换言之，在唐太宗配享先师的时代，朝廷表彰的是传经之儒。

孔庙祭祀实际上是一个多目的的礼仪，这礼仪有教育、学术、政治等成分。今天我会利用宋朝、明朝发生的一些事情来做例子，说明它实际涉及的几个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儒者身份的升降。这种提法意味着历代从祀的儒者，在其从祀之后不是永远地位不变的。比如最早配享的那二十二位，后来便变成了只是从祀，后来又有被罢黜出庙的。是什么理由，在什么背景之下，这些儒者的地位会有所升降？这升降又意味着什么事情？第二个问题我刚才已经提到了，那就是从祀的标准与时代学风的关系。第三个问题是所谓皇权与道统的关系。从祀是国家制度，从祀的儒者因为他们的书是会被当官的人念的，因此也必定与政治有关；这情况的升华就是皇权与道统的关系。如前所述，我希望用一些宋、明的事例来说明一下。

让我们先来简单看看孔庙从祀的历史。唐代在贞观二十一年从祀了二十二位先师，接下来还有几件大事发生。第一件是在玄宗开元八年（720）增祀孔门的十个高第弟子。记得刚才我讲的孔庙形制吗？孔子在大成殿靠后正中，旁边是四配，四配旁边是十二哲。十二哲是到清朝才定下来的，在康熙五十一年（1712）之前只有十哲。康熙五十一年增加了一哲，他是宋儒朱熹。朱熹不是亲炙的孔子门人，但康熙皇帝认为他的成就如同孔门高弟，所以将他升到十哲的行列，孔庙祀典中因而有了十一哲。孔子的门人中有个叫有子的，对于他的成就历来争论纷纭，有人认为他成就很大，有人认为他有问题，但到乾隆十二年（1747）时，他也获得提升到高弟的行列，所以今天看到的文庙便有十二哲。但以十哲作为一个祭祀的类别，是从唐玄宗时候开始的。开